

從閱讀文化看知識資源

——評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

● 區志堅

潘著開創學界系統地研究清季閱讀文化史的先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領域，深入地剖析了1833至1898年「西學東漸」的時空，研究晚清中國士人追求「世界知識」的歷程以及西學「知識倉庫」之特色。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昔日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多注重人物的思想、學派的學案，自上世紀70年代以後，學界逐漸由研究個人思想擴展至關注時代的觀

念脈絡和學術思潮。近年隨着海內外新文化史研究的興起，相關研究結合文化、社會及思想的維度，開始轉向注意知識傳播以及動員群眾的課題，尤其注意群眾的閱讀文化^①。在通訊科技未發達前，書籍及刊物成為群眾吸收知識的重要來源。清中葉中國門戶洞開，知識界一為甘願學習西學，一為被迫學習西學，均基於救亡圖存及富國強兵的需要，開始閱讀西書及吸收西學知識，其間呈現多元而複雜的面貌，故自清中葉至清朝覆亡，不能簡單地說成是西學「啟蒙」中國知識份子的過程。

潘光哲著《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引用只註頁碼)一書，除了開創學界系統地研究清季閱讀文化史的先河之外，作者更廣泛閱讀清中葉至民初的歷史文獻，運用歐美閱讀史、出版文化史、知識社會學、知識傳播學的研究方法，結合中國知識界的本土特色進行研究，開拓了中外文化

交流史的研究領域，深入地剖析了1833至1898年「西學東漸」的時空，實踐了作者所言：「以環繞中西關係的相關課題為主軸，述說面對變局的晚清中國士人，在追求『世界知識』的歷程，如何披覽泛閱各種書本和報刊媒介，掌握知識與資訊，藉以認識/了解寰宇情勢，廣聞增知，進而引發多重效應的故事。」(頁17)

全書共分七章。書中第一章為導論，闡述全書架構，以及介紹中國知識份子一時一代學習西學後建立的「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之特色。作者指出，全書不只是研究中國知識份子面對變局時閱讀有關西學的書本和報刊及其追求「世界知識」的過程，更藉研究西學「知識倉庫」，以便了解士子的知識資源以及他們如何以此作為思想交流的工具。第二章敘述士人的讀書世界由傳統中國學問走向西學，如魏源的《海國圖志》和黃遵憲《日本國志》等書成為各地士子廣泛閱讀和共同分享的「知識文本」的經過。西學「知識倉庫」的發展，與涉及經濟條件，書報的生產、流通及消費的「書本地理學」(geography of the book)甚有關係。第三章以曾被視為「傳統派」士子的朱一新的著作流布為例，說明西學典籍為朱氏學習新知、展開「地理想像」的重要參考材料，也因朱氏闡述世界地理知識，使他的觀點成為另一批學習西學的士子的知識資源。第四章指出倡導西學的《時務報》、《申報》之刊行，促成作者和讀者建立知識網絡，也因西學「新聞化」，加速了西學知識在地方的流

布。第五章以時任湖南學政江標及其所輯的《沅湘通藝錄》為例，說明士子重視西學與科舉考試及西學走進文化市場有關。第六章談到西學「知識倉庫」在1890年代中期已具規模，主持科考者編撰引介西方書籍之書目，如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徐維則的《東西學書錄》二書甚受士子歡迎；自1898年後，知識份子轉向假「東學」學習「西學」，書目所列書籍也多為日本學人撰寫東學及西學的著作。第七章為全書的結論，作者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仔細考察晚清士子的西學閱讀文化後，指出「閱讀絕對可以改變觀念，為推動導引生活世界的變遷，供應可能的思想動力」(頁371)，進一步概括晚清知識份子學習和吸收西學知識，把西學知識帶進文化市場，使西學知識成為士子閱讀生活中的「共同知識文本」的整體面貌。以下將介紹該書內容特色，並作評價。

一 本書內容特色

昔日研究時代思潮者多注意歸納同一時代眾多思想家的思想內容，以及任教和就讀同一學院或私塾的師生的傳承關係，本書作者則關注知識份子的知識資源，研究他們的閱讀對象及由閱讀文本引發的思想界活動，又注意到文本與一個時代的印刷文化及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這種結合社會史及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更能細緻及精確地反映思想界的概念變遷與歷史脈絡，並為晚清中國文化史與思想史書寫開拓新的研究架構。

作者關注知識份子的知識資源，研究他們的閱讀對象及由閱讀文本引發的思想界活動，又注意到文本與一個時代的印刷文化及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這種結合社會史及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更能細緻及精確地反映思想界的概念變遷與歷史脈絡。

所謂「知識倉庫」，就是把晚清士子的閱讀對象（閱讀材料）作為一個包羅萬象的思想和知識資源，讀書人可以從這個媒介提供的「思想資源」，開展自身獨特的知識和思想旅程。

（一）「知識倉庫」概念的提出

潘氏運用「知識倉庫」的概念，系統地研究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儲藏及運用西學知識的情況。早在2005年的〈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一文中，他已指出「意欲析論晚清士人『思惟世界』的歷史圖像的多重樣態，最好能夠詳密調查中國士人的『讀書世界』，精確描寫他們的閱讀活動與思惟／觀念之形成兩者間的互動過程，亦即採取『閱讀史』的角度，結合『出版史』的研究成果，進而為晚清中國文化與思想史的敘史架構，建立更形堅實和深入的基礎」^②，並用了十多年研究近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知識倉庫」。

所謂「知識倉庫」，就是把晚清士子的閱讀對象（閱讀材料）作為一個包羅萬象的思想和知識資源，士子因知識、際遇及思想的不同發展，形成一個出入在新學與舊學之間的知識交流媒介，讀書人可以從這個媒介提供的「思想資源」，開展自身獨特的知識和思想旅程，透過閱讀所得，著書立說。與此同時，出版商刊行一部又一部的書籍，使個人思想及文本在文化市場內流通，本是屬於個人的知識和思想內容（作者所言的個人「知識倉庫」），逐漸成為一個時代中國思想界的共同「知識倉庫」，甚至成為推動一個時代「概念變遷」的重要力量。作者指出，由於人們思想複雜，因此未可強說他們單純受某一類西學或傳統學問所影響；藉着研究「知識倉庫」，自可泯去強調受某

一方面知識影響之弊，也可見一個概念或思潮影響一個時代的社會文化和學術思想風尚。

本書進一步發展潘氏提出的「知識倉庫」觀點，也具有開拓、結合學術思想及社會史研究的特色。作者將論文中有關「知識倉庫」的研究成果進一步延伸為本書的主要理論框架，在書中一再指出：「包羅萬象的『知識倉庫』，儼如一方開放空間，士人自由進出，覽閱所知，想像所得，自有天地。『知識倉庫』的建立與擴展，渠眾途異，固非水到渠成，仍可隨時增瓦添磚；士人讀書世界的擴張變化，更是風華多樣，眾相並呈。」（頁49）

潘氏提出「知識倉庫」的概念，突破了近代中外文化交流課題的研究框架。近代中國知識份子面對1840年鴉片戰爭後的大變局，在已有的傳統文化知識基礎上吸收西學。一直以來，不少研究均強調西學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啟迪，又或以「傳統與西化」、「翻譯文化」及「新學詞彙」等中外文化互動的角度，闡述晚清思潮。然而，當時那群深受傳統學問影響的知識份子怎樣學習西學知識？這仍然有待系統考察。作者提出要注意研究晚清知識份子的閱讀材料，例如他們閱讀哪些西書或介紹西學的刊物，並結合同時代知識份子群體的閱讀世界作剖析，從中可見影響一代潮流的西學知識傳播情況。

本書第二章詳細闡述晚清知識界「知識倉庫」的內容。構成「知識倉庫」者為「西學」及「中學」，但晚清知識份子面對世變，多以學習西學作為實現富強的方法。不少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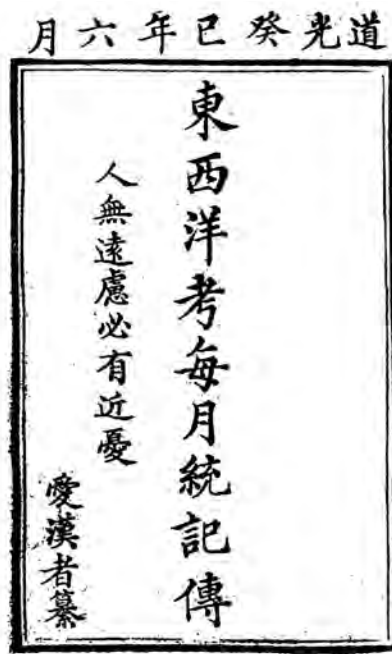
東亞地區的學者在闡述東亞諸國的主體性時，多注意到這些國家在外力未入侵前，已經孕育出走向「現代化」的因素，但此說法往往忽視了十八、十九世紀以來西歐帝國主義入侵及其輸入新文化對東亞地區的影響。我們不可忽視「近代」(modern)的中國以及其他亞洲諸國在鴉片戰爭爆發後一起經歷了「大變局」；無論是外力給殖民地帶來現代化，或是殖民地資源被侵略者掠奪，中國及東亞諸國在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出現的「變局」都與外力甚有關係。

作者論及晚清知識界建立「知識倉庫」起自1833年，終至1898年戊戌政變，因為自1898年至民初，中國學風明顯從學習西方國家改為學習東方的日本。1898年前學界以學習歐西知識為主流，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海外，但康、梁倡導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的觀點，均為清政府所

承。本書主要論述國人的西學「知識倉庫」，故把西學「知識倉庫」的發展以1898年為界線，誠為允當。

然而，作者為何把1833年視為學習西學的開端？今天學界多奉鴉片戰爭後的1842年為「近代中國」(Modern China)的開端，也有部分學者認為「近代中國」源自明末清初的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來華。由此作者指出西方傳教士與清季中國士子建立「知識倉庫」的重要關係。他以1833年於廣州出版、傳教士郭實臘(Karl F. A. Gützlaff)主編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作為近代中國西學「知識倉庫」的開端，而不取部分學者以1815年於馬六甲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為開端之說；認為從閱讀文化及知識廣泛流播的角度而言，前後出版六年(1821年停刊)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留下影響的痕迹，並不具體」(頁51)，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吸引了編寫

作者在書中論及晚清知識界建立的「知識倉庫」起自1833年，終至1898年戊戌政變。作者提出學術界應多注意鴉片戰爭前國人學習西學知識的情況，並應重新審視1842年前後為「近代中國」開端的觀點。



傳教士郭實臘(Karl F. A. Gützlaff)主編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資料圖片)

一個時代的「知識倉庫」的構成是會變動的。晚清士子的閱讀世界，首先是閱讀傳教士的漢文譯本，再藉着閱讀漢譯日文文本及日文原著以學習西學。因應時代的轉變，士子吸收知識的對象隨之更改。

《海國圖志》的魏源和編撰《合省國說》的梁廷枏等倡導西學者注意及引用，可見《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為『知識倉庫』的建設，打下了廣博堅實的地基」（頁52）。作者從晚清士人建立西學「知識倉庫」的角度考察，提出學術界應多注意鴉片戰爭前國人學習西學知識的情況，並應重新審視1842年前後為「近代中國」開端的觀點。

作者繼而指出，「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對世界局勢的知識和理解，頗稱貧乏薄弱」（頁52），群眾透過很多途徑建構西學「知識倉庫」，不能簡單地說西書及西學一經傳入，便廣泛地為國人所接受。作者以文本比較的研究方法，說明西學知識被近代知識份子再生產的情況，例如魏源《海國圖志》引錄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對美國政體和選舉原則的表述，又將中國官制比擬裨治文倡言的美國制度。作者再把《美理哥合省國志略》的文本與梁廷枏《合省國說》的內容相比較，發現梁氏對於美國制度的表述既參考《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也和原書述說的內容略有差距，由此得出結論：「顯示在這座『知識倉庫』的建立過程裏，資訊知識的積累儲蓄，與或是刪省或是淘汰或是更易的過程，往往同步並行。『知識倉庫』的建設者，面對着現成的材料，認知各有所偏，引徵之際，又出以己意，大動『文字手術』。因此，他們的成果，其實就是知識/資訊的『過濾器』。」（頁62）

作者認為，一個時代的「知識倉庫」的構成是會變動的，隨着人

們閱讀喜好的不同，他們的「知識倉庫」也有所變化。昔日研究多強調西學對中國「啟蒙」的一面，看似國人廣泛接受西學。作者以康有為和王韜對《海國圖志》等書不滿，以及《海國圖志》等書對年輕一代仍具啟蒙作用為例，說明「士人追求『西學』的讀書活動，往往『博覽群書』」，一本書的價值高下，在於讀者自身的閱讀體會（頁71）。此外，即使閱讀同一本書，士人亦會因為現實環境之需要而各有側重。例如傳教士湛約翰（John Chalmers）主編的《中外新聞七日錄》中介紹《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的文章，旨在頌揚「萬國公法」乃普遍真理；與傳教士關係密切的王韜則認為「萬國公法」不具有「公」的性質，只是國際鬥爭的工具。由此可知，因應不同讀者的生活歷練，對讀本的回應也有不同，「同一部書的讀者，可能同樣都置於和傳教士交接往還的環境，彼此對國族處境的關懷大不相同，認知立論，自是難能調和」（頁75）。

作者進一步研究積極推介西學的王韜之閱讀世界，說明王氏受日本岡本監輔編的《萬國史記》影響；又如推動革命的唐才常，也藉着閱讀日本人的著作來了解西學。可見晚清士子的閱讀世界，首先是閱讀傳教士的漢文譯本，再藉着閱讀漢譯日文文本及日文原著以學習西學。因應時代的轉變，士子吸收知識的對象隨之更改，這就如作者所說：「『知識倉庫』的構成建設，往往隨時勢現實之需要，轉易變化。」（頁91）

(二) 知識流布與「書本地理學」

在本書第三章，作者指出知識流布與「書本地理學」甚有關係，並借用哈維 (David Harvey) 「地理想像」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的觀念進行研究。哈維指出，地理想象能使個人得以確認空間與地點在自己的生命史上的角色，可以對目視所及的空間環境和自己發生關聯，使得個人雖未往遠方空間或親歷事件，仍可以理解遠方空間的人民生活，甚至表述其生活情況 (頁 150，註釋 30)。潘氏依此觀點，分析晚清士子朱一新研究邊地的著作，得見朱氏既要學習和吸收傳教士等傳入的世界地理學新知識，也以西學地理知識批評外力入侵，表達身處清代時空下個人對時局的感受及國族主義情感 (即使他生平從未前往邊疆)。

此外，作者藉研究曾被視為「保守」學者朱一新的「知識倉庫」，以及朱氏的個人「知識倉庫」成為群體「知識倉庫」的過程，反映不同群體會按自己所需，擷取朱氏思想的內容，為所屬群體構建「知識倉庫」，如當康有為倡導改革的言論流傳甚廣時，一些不滿康氏的讀書人便以朱氏的著作為「抗顏康有為學說的『思想武器』」 (頁 121)；一些知識份子如楊度因清中葉邊防告急，故擇取朱氏倡導西學和日本地理學的觀點。

朱氏雖生於清中葉邊疆史地學興起之際，時人多以考據及沿革地理的方法研究邊疆，但他卻能注意十九世紀域外的地理資訊，在考據及沿革地理的基礎上，以西學及日

本地理學知識彌補時人的不足。朱氏研究學問的視野較同時代研究沿革地理學者更為深入和廣闊，故當時崇尚西學者多引用朱氏的觀點。朱氏援引西學及日本地理學知識，不獨成為構建其個人西學「知識倉庫」的資源，也成為楊度等人西學「知識倉庫」的資源，如作者所說，「採如是『以西證中』，『中西互證』進行地理學知識之生產的具體實踐取向，或已形塑了一個『論述社群』 (community of discourse)；以朱一新的例子推論，在晚清以降的中國，這個『論述社群』已然萌生問世」 (頁 143)。

同時，作者研究朱氏以西學地理知識治中國傳統沿革地理的方法，指出這是「世界觀與概念架構」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頁 145)，從中得見中國從沿襲傳統地理學走向吸收西方地理學的轉型時代。誠如作者所言：「朱一新涉獵『西學』顯現的場景，正可顯示，閱讀那些著作，既是他開展『地理想象』的知識基礎，也是可以讓他起而駁斥各種『異端之說』，護衛保障以『三綱五常』的『國族傳統』的理據，朱一新坐閱披覽並徵引『西學』諸籍而不輟，清楚展現，『知識倉庫說』的儲備，在各方士人的書房裏，確實佔有一方空間。」 (頁 146) 把朱氏的觀點放回歷史現場，已見其超越時人之處，這也是時人把其著作作為群體西學「知識倉庫」的原因。

(三) 報刊與西學「新聞化」

作者在書中指出構建「知識倉庫」的另一重要力量為報刊。報刊

作者藉研究曾被視為「保守」學者朱一新的「知識倉庫」，以及朱氏的個人「知識倉庫」成為群體「知識倉庫」的過程，反映不同群體會按自己所需，擷取朱氏思想的內容，為所屬群體構建「知識倉庫」。

作者把《時務報》視為一個知識群體交流知識和思想觀念的網絡，並開拓了一個研究報刊流布的外緣及內緣的研究領域。外緣因素如編輯的人際網絡及各地方社群的協作力量；內緣因素為刊載的內容。

不只盛載西學知識，也因攜帶方便，使西學知識加速在各地流播，「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以及促使西學「新聞化」（頁20）。已有很多學者研究近代中國報刊與知識流布的關係，但多未能詳細考察究竟讀者群如何受到報刊的影響。閱讀效益往往為研究群眾閱讀課題時最難評估之處，研究者要翻閱大量回憶文字或作文獻比較，來印證某份報刊對某人思想的影響。作者以1896年由知識份子創辦的《時務報》與讀者群的回應為例，說明西學的「新聞化」有助推動西學知識在地方流布。因為報刊能以簡單的表述，刊載最流行的言論及西學思想，隨着報刊廣泛流通，西學新知的信息就能直接傳給讀者。

本書第四章把《時務報》視為一個知識群體交流知識和思想觀念的網絡，並開拓了一個研究報刊流布的外緣及內緣的研究領域。外緣因素不涉及刊物內容，如編輯的人際網絡及各地方社群的協作力量；內緣因素為刊載的內容。作者結合這兩方面的因素研究《時務報》的流通情況及其構建讀者群的動力。書中指出，「和官府的資源/網絡有着千纏萬繞的關係」的《時務報》為傳達官方言論和民間聲音的載體，由不少讀者捐款籌辦，得以加強其「社會滲透力」（頁173）；而且報刊主編汪康年的人際網絡極廣，地理學家鄒代鈞等人又協助開拓《時務報》在湖南的文化市場；地方官及其幕客也推動該報在各地域的流布，「透過各式各樣的人際關係網絡，各個地方區域無形中也可能構成一個藉由閱讀報刊並交換知識

情報的讀書社群」（頁176）。讀者如沈克誠、謝榮光等，因閱《時務報》受到啟發籌建地方學堂；也因該報讀者群的擴大，漸漸在地方上形成一個由借閱者及訂戶組成的信息交流網絡，《時務報》成為地方上讀者「共潤同享的精神糧食」（頁177）。

潘氏指出《時務報》的作者來源眾多，有賴主持報館者的人際網絡，故供稿不絕，而且很多來稿呼應《時務報》刊載文章的觀點，這些回應文章不止來自上海及廣東讀者群。遠至山西蒲州的讀者楊承祖因讀梁啟超在《時務報》撰寫的〈中國之將強〉一文，認同梁氏倡導中國非無人才的論點。從讀者來稿中關於變法維新的觀點，可見《時務報》倡言變法改革的言論已廣傳於江、浙、皖、湘、鄂、川等長江流域，更遠至直隸、廣東一帶。報刊漸漸形成一個「中國士人群體可以共享同潤的『公共空間』，《時務報》的讀者對它的發展，有各式各樣的意見，報方也很重視讀者的意見，有各式各樣的反應與調整」（頁186）。

作者尤指出《時務報》刊載的內容成為吸引讀者的重要力量。《時務報》翻譯了不少外國有關中國內部動亂的報導並引介世界新學的知識，故廣受國內士人關注，如曾刊載海內外有關「膠州灣事件」的信息，給予國人事件發生的「現場感」。《時務報》譯稿使用「東洋」、「電犁手機器」等新名詞，隨着該報的讀者群日廣，這些新名詞也為國人廣泛運用。作者特別舉例指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和清中葉以後

出版的一系列《經世文編》，均多引用《時務報》使用的漢譯詞彙，由此可知「《時務報》的問世，清楚顯示了『西學』的『新聞化』的面向。它以新聞形式供應的『世界知識』，既具『實用』意義，也是讀者掌握世局變化的入門之鑰，在在成為『知識倉庫』的構成要素」（頁208）。潘氏指出「簡單的新聞傳播模式是：世界上發生了新聞，報紙（媒體）報導之，大眾消費之。其實，這個模式的每一個環節都是更為複雜的」（頁196），由是得見作者、出版者、讀者、文化市場與知識流布的互動關係，以及《時務報》在地方上廣為流傳的原因。

（四）科考教材與「知識倉庫」

有些學者認為，依據考試制度而出版的教材，只是傳播官方「認可」的知識，但作者指出配合考試出版的教材或參考書，也是加速知識傳播、鞏固西學「知識倉庫」的工具。書中第五章以湖南西學知識傳播為例，說明扮演「新酒」角色的西學，藉科舉體制的「舊瓶」，得以傳往知識界。

湖南為推動維新運動的重鎮，近人多研究梁啟超和譚嗣同在湖南推動變法，也注意到湖南士紳反對新學的言論，但多未關注梁氏在湖南輸入西學之前當地西學知識傳播的情況。潘氏指出湖南學政江標與當地西學流播的關係，江氏積極要求地方士子學習西學，其認為西學有助開啟民智的觀點，為構建湖南士子「知識倉庫」的西學內涵、確立西學在湖南發展的社會文化基

礎。作者更引用湖南士子的課藝文章支持其論據。江氏把士子課藝文章輯錄成《沅湘通藝錄》，從該書內容足見湖南士子吸收西學的情況。十九世紀末，上海及廣東一帶的流行讀本之一為鄭觀應編撰的《盛世危言》，作者通過文本比較，把《沅湘通藝錄》收錄湖南士子陳璜、陳鳳光、陳虬等的課藝本，與《盛世危言》內容相較，得見湖南士子多引用或抄錄鄭觀應的觀點。由於江標執掌地方學政，他提倡西學的觀點自然為參加地方科考的士子所歡迎，由此促使了湖南士人從學習傳統學問轉向西學。此外，也因政府倡導西學，以西學為地方課藝的內容，促使傳播西學的載體如報刊、書籍大量出版，把江氏的西學「知識倉庫」帶進文化市場。隨着文化市場發展，閱讀西學群體也日漸擴大；文化市場的效益，反過來推動江氏尚西學的個人「知識倉庫」，成為群體「知識倉庫」，出版商更翻刻江氏推薦的西方書籍，可見「『西學』的知識空間，意欲要在科舉體制之下擴充蔓延，與現實的物質條件，實在息息相關」（頁280），科考的內涵也改變了地方的閱讀世界。

（五）書目構建「知識倉庫」

作者運用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展示知識份子編刊書目，有助構建「知識倉庫」。昔日不少學者把書目作為「工具書」，尚未如潘氏那樣注意結合書目與知識傳播的研究領域。作者把近代學人編書目視為「讀書秩序」，書目引導了士子把西學及經日本傳入的知識放進他們的

江標提倡西學的觀點為參加地方科考的士子所歡迎，由此促使了湖南士人從學習傳統學問轉向西學。也因政府倡導西學，以西學為地方課藝的內容，促使傳播西學的載體，如報刊、書籍大量出版，把江氏的西學「知識倉庫」帶進文化市場。

昔日不少學者把書目作為「工具書」，尚未如潘氏那樣注意結合書目與知識傳播的研究領域。他把近代學人編書目視為「讀書秩序」，書目引導了士子把西學及經日本傳入的知識放進他們的「知識倉庫」。

「知識倉庫」；藉比較不同書目內容，可見不同時代的編者及讀者研讀對象的變化和差異。

繼江標之後任湖南學政者為徐仁鑄，徐氏提倡「諸子之學多與西政、西學相合」（頁333），近於梁啟超推崇西學的觀點，徐氏也推崇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西學書目表》倡言「應讀之西書，及其讀法先後之序」，把有關算學、重學、電學等「西學」書籍列入上卷，再把有關史志、官制、學制、法律等「西政」書籍列入中卷。士子因學政推崇西學，故閱徐氏《輶軒今語》及梁氏所列西書，以應課藝，由是這些著作均可作為引領士子的「審門徑」（頁324-26）。作者指出士子閱讀《西學書目表》內所列西書，把《列國歲計政要》、《華盛頓傳》等西學書籍放進「知識倉庫」，又引述蔡元培、朱祖榮等人對《西學書目表》的正面評價。此外，因《西學書目表》甚受地方士子歡迎，在湖南及江浙等地甚至出現盜印本。

作者以文本比較的研究方法，將晚清學界甚受歡迎的徐維則編《東西學書錄》與江標、徐仁鑄先後督辦的《湘學新報》內的「書目提要」相比較，得見徐維則所列西學書目「基本上承繼」《湘學新報》所列書名（頁336）。作者指出，對於想要窺探西學的士人來說，他們看重的是如何從這些讀書指南所提示的方向，尋覓讀書門徑。當時「面向新進士人的宣告之詞，儼然完全接受同意梁啟超等先行者建構的『讀書秩序』；他們對於『知識倉庫』裏的各種儲備，排列閱讀先後的次序，

月旦優劣，品評高下，乃是理所當然」，為士子「建構的『讀書秩序』，提供了再生產、再流通，再創造的無限可能空間」（頁340）。其間，雖有湖南士紳葉德輝不滿西學言論，但因江標、梁啟超等人為西學在地方上流布建立了社會文化基礎，促使西學傳播在民間成為「不可易移」之勢（頁341）。

二 本書評價

雖然全書研究重點在於討論晚清中國士子構建西學的「知識倉庫」，但作者並沒有因此而忽略甲午戰爭後中國知識份子「自西入東」的求學路徑轉向。作者依據研究蔡元培的專家高平叔所指，蔡氏譯德國泡爾生 (Friedrich Paulsen) 《倫理學原理》(System der Ethik) 一書，是「以日本為媒介，取蟹江義丸刪節翻譯的日文譯本，對照德文本譯出是著，『而詳略則一仍蟹江氏之舊』」（頁342）。書中又結合近人研究成果，指出梁啟超署名翻譯的《國家論》一書，乃是把日本譯者吾妻兵治對德國學者伯倫知理 (Johann Bluntschli) 《為有文化的德國公眾而寫的德國政治學》(Deutsche Staatslehre für Gebildete) 的漢譯本，作文字修改及節錄部分內容之結果，「就此而言，伯倫知理對梁啟超的影響，其實是『日本化』的伯倫知理」（頁343）。由此可見，「從蔡元培、梁啟超個人的讀書世界的轉折，從『日本化』的伯倫知理在中國讀書界好似風靡一時的樣態來說，約略從1830年代末

期的建設大業的『知識倉庫』，即便屹立多年，在新時代的浪潮侵蝕之下，恐怕再也支撐不住了。它曾經是供應人們汲引『思想資源』的開闊空間，頓時好似再也不值得進入的讀書天地。就梁啟超而言，開始動手引介評論的，已經是日本的書冊了」（頁346）。作者比較徐維則編《東西學書錄》及顧燮光編《增版東西學書錄》內所列書名，發現前書沒有開列日本書冊，認為「前此的『知識倉庫』，不僅不是不可動搖的宏樓偉殿，更已失其效，有待『未來』，以日本為動力而興建的『知識倉庫』，必將可以取而代之」（頁348）。隨着日本供應「簇新的『思想資源』」（頁349），自日本傳入的知識漸漸為學界所重視，反映甲午戰爭後時人閱讀世界轉變的趨勢。

作者除了開拓閱讀文化研究課題外，也開闢了其他研究課題，如前人多未注意的湖南學政江標、徐仁鑄等地方官員及士紳與西學知識在地方流布的關係。同時，作者也研究了學界多未注意的傳播西學知識的載體，如1875年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譯《列國歲計政要》、1897年黎汝謙、蔡國昭譯《華盛頓全傳》等漢譯西學文獻與晚清知識傳播的關係，得見《列國歲計政要》成為不少知識份子閱讀西學的資料，由此擴展了研究林樂知與中西文化知識交流的研究課題。

當然，閱讀本書後，筆者尚感到以下課題有待深化研究。第一，不少學者已指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走向世界，具有「掘折與頓挫」的特色^③，當這群主張學習西學的知

識份子走向現代世界時，愈認為學習西方知識可以富國強兵，就愈感到痛苦，因為他們對西學有着一種愛恨交纏的心態和強烈的民族主義負擔，與只求富國強兵及深信學習西學便能改革國情的學者講求實用的心態甚為不同。讀者可以研究以上兩者「知識倉庫」之異同，從而獲得一幅更廣闊的知識份子面對西學衝擊時的精神面貌圖景。

第二，作者可以在「知識倉庫」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名詞競爭的課題。研究思想資源時，除了聚焦於讀者的閱讀世界外，也可以注意隨着西書漢譯，帶動了漢譯名詞在一國的流布。近年研究翻譯文化的學者，如黃克武、沈國威、王宏志等，已注意到隨着漢譯詞彙在中國流布，同一時代的不同學人會以不同漢字翻譯外文詞彙。在漢譯詞彙未統一之前，出現了詞彙競爭，如學界曾以「進化」和「天演」二詞，翻譯英文詞彙“evolution”，最終以「進化」代替了「天演」^④。由此可見，漢譯名詞本身即便不是關乎學術史研究，也是一個結合翻譯文化、中外文化、出版文化以及知識社會學等跨學科研究的課題。

此外，潘氏一書出版後，不斷有近現代中國知識份子閱讀史的相關研究成果問世，讀者尚可以在本書的基礎上，閱讀以下專著：欲了解晚清報刊與讀者心靈轉變的關係，可參見卞冬磊著《古典心靈的現實轉向：晚清報刊閱讀史》；欲了解書刊廣告與新書刊行的關係，參見范用編《愛看書的廣告》；欲了解晚清教材與女子西學知識傳播的關係，參見夏曉虹著《晚清女子國

雖然全書研究重點在於討論晚清中國士子構建西學的「知識倉庫」，但作者並沒有因此而忽略了甲午戰爭後中國知識份子「自西入東」的求學路徑轉向。自日本傳入的知識漸漸為學界所重視，反映甲午戰爭後時人閱讀世界轉變的趨勢。

研究思想資源時，除了聚焦於讀者的閱讀世界外，也可注意隨着西書漢譯，帶動了漢譯名詞在一國的流布。在漢譯詞彙未統一之前出現了詞彙競爭，如學界曾以「進化」和「天演」二詞翻譯“evolution”。

民常識的建構》；欲了解圖書館與知識傳播的關係，參見余訓培著《民國時期的圖書館與社會閱讀》；如欲宏觀地研究晚清教科書與士子構建知識的關係，可參見沙培德(Peter Zarrow)著《教育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世界中的知識、社會和教科書，1902-1937》(*Educating China: Knowledge, Society, and Textbooks in a Modernizing World, 1902-1937*)^⑤。以上研究成果多關注晚清至民國時期的教材及民間閱讀情況，雖不完全符合潘氏研究1833至1898年知識份子閱讀世界之範圍，但讀者從中可以宏觀整個晚清閱讀世界並加深對其了解。

誠然，潘氏此書有尚待優化的地方，但瑕不掩瑜。潘氏運用閱讀文化、文化交流、學術思想史、知識社會學、出版文化、目錄學、文本比較等研究方法，結合中國知識份子閱讀世界的特色，開拓了新的學術思想文化研究方向。作者在書中大量運用學界少見的文獻及中外研究成果，更廣泛閱讀學人回憶錄及日記，其論據有堅實的資料支持。我們期待作者編一本近現代中國學人西學閱讀資料集，並把研究方向延伸至1898至1911年近代中國士子的「日本學」閱讀世界，甚至將研究拓展至1911年至1949年前中國讀書人的「俄學」(以俄國學問為師)及「德學」(以德國學問為師)「知識倉庫」，全面研究近現代中國走向民族國家歷程時，身處其中的知識份子的閱讀世界，以及由閱讀世界反映知識份子的精神世界；期望作者總結不同時代的「知識倉庫」，呈現另一幅近現代中外

文化交流的圖像，為今後研究中外文化互動史，建立新的研究視域。

註釋

① 近年出版了不少關於閱讀文化與知識傳播及動員群眾的研究成果，參見Roger Chartier, *Frenchnes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From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to the History of Reading* (Worcester, MA: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1988); Robert Darnton, “History of Reading”, in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ed. Peter Burk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177-84。

②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第16卷第3期(2005年9月)，頁143。

③ 參見溝口雄三著，陳耀文譯：《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④ 參見黃克武：〈何謂天演？嚴復「天演之學」的內涵與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5期(2014年9月)，頁129-86。

⑤ 參見卞冬磊：《古典心靈的現實轉向：晚清報刊閱讀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范用編：《愛看書的廣告》(北京：三聯書店，2015)；夏曉虹：《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余訓培：《民國時期的圖書館與社會閱讀》(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Peter Zarrow, *Educating China: Knowledge, Society, and Textbooks in a Modernizing World, 1902-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區志堅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